
战争中的乡愁

——论萧红小说集《旷野的呼喊》

李煜哲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40年，萧红的小说集《旷野的呼喊》初版，依次收入了《黄河》、《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逃难》、《山下》、《莲花池》、《孩子的讲演》等七篇小说。这部小说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集中所收入的作品，除《黄河》作于汉口，其他诸篇均写于重庆，是萧红在逐渐撤退到大后方重庆的过程中完成的。第二，收入集中的七篇小说，都是以抗日战争为故事背景，表现战争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选择。

与其他轰轰烈烈的抗战文艺作品相比，萧红独特地赋予了战争抒情的意义。在1938年《七月》杂志举办的两次座谈会中，与会者关于参与紧张的战斗生活与写作之间的矛盾问题多有论辩。而萧红则在会上指出，一方面战时的写作素材处处可寻，并不一定需要跟随军队才能表现战争：“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吓得发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¹另一方面，作家要写出好的作品，应当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握住的。”²在阅读萧红的作品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她虽然也在观察战时生活，却似乎从未拿出知识分子的姿态去“考察”战争情形：她只是所有饱受战争苦痛的平凡人之一，而她的性别更让她成为平凡人中的弱者。无论是小说集《旷野的呼喊》，还是萧红表现战争的诸多散文，都表现出了她作为一个身居后方的、被保护的普通百姓，如何细腻地体察着这个时代的喜怒哀乐。而战争中的乡愁，则是弥漫于这些文字背后的一个话语，一种情感。因此，本文将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为主要讨论对象，试图从“乡愁”这一面向，对萧红关于抗日战争的书写进行分析。

一、因“家”而“乡”

鲁迅曾使用过“乡愁”一词，来评价蹇先艾、许钦文等人的乡土文学创作：“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

¹ 《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

² 同上注，第253页。

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³ 鲁迅对乡土文学中“乡愁”的体认，主要指向背井离乡的写作者们对于故乡风物的追忆，尤其是对故乡已消逝的事物的回想。鲁迅的“乡愁”表述一方面接近于这个语词的本义，即某种因思念故乡而引起的愁绪；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乡愁”不仅包含对故乡的思念，还包含对一种永远逝去而不复返的时光的怀念。在后世学者的研究中，“乡愁”的含义则进一步拓宽到地域文化层面。以对沈从文的研究为例。王德威指出沈从文作品体现出“想象的乡愁”，书写着湘西的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他的湘西乡愁不仅源于对出生地的眷恋，也出于对文学佳作的想象。”⁴ 赵园也关注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只能是现代知识者沈从文眼中的、审美想象中的湘西，作为这一个现代人的审美理想的感性显现的湘西。”⁵ 这类论述，赋予“乡愁”以充分的文化意味，关注写作者的故乡书写所营构的地域性文化景观。在这样的关怀下，对于故乡的追寻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文化寻根，并寄托某种存在论式的生命思考。

而萧红的战争书写为我们呈现的“乡愁”，则更多是回到了“乡愁”的本义。她的“乡愁”，是非常具体的离乡之愁——这种具体性，在于对“家”的想念与渴望。我们来看《旷野的呼喊》集的第一篇小说《黄河》。对黄河上的水手阎胡子而言，打酒和运货是他日常生活的两件大事，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扰乱他的心。一天，阎胡子刚打酒回来：“阎胡子的脚板一踏上船身，那种安适，把握，丝毫其他的欲望可使他不宁静的可能都不能够捉住他的。”⁶ 然而，一个八路军小伙子的搭船，却改变了阎胡子这天的安宁心境。当他发现这个小伙子属于山西的游击队时，他想起了赵城，那里有他的家。他失了神：“阎胡子坐在舱里佛龕旁边，舵柄虽然拿在他的手中，而他留意的并不是这河上的买卖，而是‘家’的回念。直到水手们提醒他船已走上了急流，他才把他关于家的谈话放下。但是没多久，又零零乱乱地继续下去……”⁷ 对于家人的思念与回忆不断地勾起阎胡子关于山东与山西两个地方的“乡愁”——山东是他的出生地，山西则是他现在的小家

³ 鲁迅：《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鲁迅编选：《小说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版，第 9 页。

⁴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1 页。

⁵ 赵园：《论小说十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6 页。

⁶ 《萧红全集·小说卷一》，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1 页。

⁷ 同上注，第 193 页。

所立足的地方。而第二篇小说《朦胧的期待》中的李妈，有“九江的家乡”⁸却没有自己的“家”：她敏感地听着太太提到的地名，但无论是武汉、大冶还是田家镇，李妈所关心的只是她的心上人金立之是否需要上前线去作战，他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对她而言，金立之是她重构“家”的寄托所在，她攒着工钱，只希望战争结束后金立之能回来“安家”⁹。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有“家”之处才可为“乡”。对于家人的思念，对于家庭的渴望，是人们在战争中的“乡愁”的主要旨归。赵城、大冶，小说中人物所关心的地名，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空间，更处于一个具体的时间中——人们被迫与他们所牵挂的地方分离，他们思念的人们可望而不可即，是由于抗日战争的存在。地名所指向的空间，只有在战争这个时间场域下，对于人们才有特殊的意义。

在紧张的战局中，“乡愁”的关键媒介，不是地域文化，而是家人，对于萧红而言也是如此。但一开始萧红所自觉追求的却是“离乡”：父亲掌控下的家庭令她痛苦万分，于是她主动地逃离了自己的家庭，从此流浪四方。父亲的家庭是萧红不愿回去的地方，没有了这个家，萧红又在哪里找到她对于东北之为“故乡”的身份认同呢？两个人物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萧红的祖父和萧军。一方面，通过对于祖父的想念与记忆，萧红将她所思念的那部分东北，永久地封存在一个只属于过去的时空中。祖父早已离世，没有了祖父的家乡，对于萧红而言是一个不必再回去的地方。萧红通过写作回到她童年的呼兰河、“后花园”，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对她而言在人间再也无法觅得的场域。她用记忆的体温不断烘暖那个时空，同时也在不断地逼仄那个时空。在一定程度上，萧红用回忆的方式，切断了那个时空与未来、与现实联系的可能。依托于祖父与童年而存在的故乡，是一片独属于萧红的封闭领土。

另一方面，萧军所指向的，则是存在于现在与未来两重时间轴上的故乡。通过萧军，萧红重新建构起一个更为广大的“东北”。她愤慨于这里被日军所蹂躏，她想象着未来的回乡——以萧军的妻子的身份。在《失眠之夜》中，萧红感到了“故乡的思虑”：“烦躁，呕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¹⁰她听着萧军关于自己家乡的风景与家人侃侃而谈，心里想着的却是“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¹¹。《八月之日记二》中，萧红则写到，萧军错把在东北时形成的气候感知习惯用于南方；她虽然清楚地知道萧军的错误，却极力避免向萧军提起“南方”这两个字。“自从这上海的炮声开始响，常常要提起家乡，而又常常避免着家乡。”¹²萧军对于东北家乡的思念，使萧红现实地感受到家乡的存在，

⁸ 同上注，第 177 页。

⁹ 同上注，第 179 页。

¹⁰ 《萧红全集·散文卷》，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0 页。

¹¹ 同上注，第 243 页。

¹² 同上注，第 264 页。

切身地感受到了战火造成的失乡之苦，以热烈的笔调讴歌“长白山的血迹”¹³。对于萧红而言，萧军强化了东北作为她的现实层面的家乡的意义。萧红在战争中体会到的具体的乡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依托于萧军的“家”的期待而建立起来的。在与萧军决裂后，萧红虽然仍会写作一些怀想东北、鼓舞抗日的文字¹⁴，但这些文字中，个体的抒情愁绪却难觅踪迹。而那个回不去的童年记忆中的家乡，则成为萧红生命后期的重要依托——她从战争的现实“乡愁”中走出，在呼兰河的风土人情中，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回乡”之路。

二、被悬置的“呼喊”

在战争中，“乡愁”的指向是具体的，被战争驱赶着远离家园的人们大都渴望着回到故乡的那一日。流浪者在他乡思念故乡，实即向故乡表达他们欲归而不得的愁绪：对于他们来说，故乡就仿佛慈祥的老母，她永远以温暖的怀抱，欢迎流浪的子女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归来。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内蕴有一种对话性。在“乡愁”中，流浪者向现时难以回归的故乡发出遥遥的呼喊，以召唤未来回归之日的方式，使自己从当下离乡的苦闷中获得暂时的解脱。在与故乡的“对话”中，并不存在情感无法传达给对方的问题：故乡是无法言说的，这使得游子可以对故乡尽情贯注自己的想象，并由此温存与安慰自己。

然而，当承载着乡愁的对话面向具体的个体时，被悬置的“呼喊”在战时生活中却常常发生。在《朦胧的期待》中，李妈小心翼翼地脑海中斟酌着想要向金立之说的话，但这些话却无一传达给了金立之，李妈想象的对话始终没有实现。李妈只能独自在小巷里徒然地呼唤着金立之的名字：“远近都没有回声，她的声音还不如落在山涧里边还能得到一个空虚的反响。”¹⁵ 萧红在此以冷峻的笔调，写尽了李妈的落寞。无法传递的呼喊与其投掷于有情的人世间，不如投掷于无情的大自然，即使“一个空虚的反响”都比这黑暗中的沉默要好得多。这一无法实现的对话最终进入了李妈的梦境，李妈的呼唤在梦中得到了金立之的回应，李妈也因此梦中得到了虚幻的安慰。可现实中的她，却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日日在愁苦之中”的歌谣，让无法得到回应的乡愁随风而散，把自己埋葬在孤独的思念中。

类似地，我们在《旷野的呼喊》中，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对立：在小说的最后，陈姑妈呼喊陈公公，陈公公呼喊儿子，然而这样的呼喊却都被旷野上的大风吞没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无生命的狂风也仿佛在叫喊，而它的叫喊却能够

¹³ 萧红：《长白山的血迹》，见《萧红全集·散文卷》，版本同前注，第222-223页。

¹⁴ 如《无题》对于东北气候的描述、《寄东北流亡者》向流亡的东北同胞们发出抗战的鼓励，见《萧红全集·散文卷》，版本同前注。

¹⁵ 《萧红全集·小说卷一》，版本同前注，第177页。

对人间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小说开头与结尾部分所大段铺陈的种种混沌景观。风的呼喊得到了世界的回应，而人的呼喊却陷于无地——“呼喊”的被悬置，难道仅仅是由于无情的狂风吗？显然不是。儿子被日军抓去，才是陈公公与陈姑妈的“呼喊”无法得到呼应的真正原因。只要儿子不参加义勇军，陈公公就认为生活可以平稳地过下去，儿子娶妻生子，最后活成像自己一样的老人。然而战争扭转了陈家的命运，让陈家痛失独子，原本圆满的小家从此支离破碎。无论是陈姑妈还是陈公公，他们所呼喊的，是完整的“家”；而《旷野的呼喊》所揭示的，则是在战时“家”之为生存皈依的脆弱性。当“家”已被战争摧毁，人们又该如何寄托自己的心灵，在战争中安顿自我？小说最后所显示的，正是这样的追问：

“等他重新爬起来，他仍旧向旷野里跑去，他凶狂地呼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的是什。风在四周捆绑着他，风在大道上毫无倦意的吹，树在摇摆，连根拔起来，摔在路旁，地平线在混沌里完全消融，风便作了一切的主宰。”¹⁶

陈公公最后的疯狂呼喊，已经不仅仅是召唤儿子的归来，而更是在质询自己。如果对《旷野的呼喊》中的“风”作一点象征性的解读，我们可以把“风”视为残酷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洪流让许多像陈公公一样的人们就像树一样被连根拔起、摔在路旁，无情地践踏着人们的命运。萧红在散文《窗边》中，也把人和树木并举：汽车运载的伤兵们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好像正在受着创痛的不是人类，不是动物……静静的；静得好像是一棵树木”¹⁷。战争的铁蹄下，生命就如同草芥；人们只有努力在“家”中寻找相互依存的温暖与依托，对小家的维护是他们在这个时代微弱而具体的抒情方式。然而在战争中，个体的抒情却举步维艰，就如萧红在《两种感想》的结尾所昭示的那样：“只剩我一个人，怎么谈古论今？只好对着江水静静的坐着。”¹⁸

其实，与其说一个人的“谈古论今”是不可得，不如说是无意义。战争让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无法逃避，即使是《逃难》中胆小如鼠的中学教员何南生，还有《山下》中那远在四川的林姑娘等普通乡民。战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陷入了不可控的境遇：何南生在逃难途中行李被人流挤走，林姑娘的生活则随着“下江人”的避难于当地而发生了多次转折。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个体的力量是如此微弱，人们只有在于他人的交集中，才能不时地体会到一些细微的温暖与希望——身为流亡者之一的萧红也是如此。她看到士兵抱着孩子，于是想象“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¹⁹；在躲避重庆轰炸的过程中，她与陌生的老人发生交谈，会心地安慰着彼

¹⁶ 《萧红全集·小说卷二》，版本同前注，第27页。

¹⁷ 《萧红全集·散文卷》，版本同前注，第255-256页。

¹⁸ 同上注，第267页。

¹⁹ 萧红：《小生命和战士》，见《萧红全集·散文卷》，版本同前注，第258页。

此²⁰。在战火纷飞中，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可以向彼此传递生存的力量。

因此，当面向具体个人的“呼喊”被悬置，组构或维护“家”的希望得不到实现，在精神上面向家乡与家乡更多的人们的“乡愁”，或许能让被悬置的“呼喊”得到解脱。“乡愁”所承载的，是个体与更广阔的人群息息相关的感觉：对于流浪者而言，“乡愁”背后不仅有自己所直接归属的家庭，还有左邻右舍、父老乡亲，有许许多多共同生存于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人群”成为了战争中的“乡愁”的力量。

三、“乡愁”的失落

在小说《黄河》中，阎胡子与八路军兵士的对话构成了“乡愁”的主要叙述。然而这一叙述表面上呈现的是对话的形式，实际展开的则主要是某种“独语”：阎胡子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家乡故事，渲染浓厚的个人乡愁；而与阎胡子对话的那位着急赶路的八路军兵士，却并没有充分体会这份乡愁。换言之，阎胡子的“乡愁”话语并没有产生充足的共情效果。这位兵士的妻子死了，阎胡子的父母双亲也早已在山东的洪灾中去世，两人共享类似的生活经历，本应更易拥有对于彼此的同情。但小说却并未写出这一点。共情为什么未能实现呢？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这位兵士是要过河去“赶队伍”的——对于一名战士来说，军队在战时发挥了“家”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军队可以为“家”，它却无法成为“家乡”。这是一个永远在移动、并且终有一天会离散的集体，虽然能给士兵们带来暂时的家的温暖，但当战争结束，军队里的人们终归要各奔东西，回到自己各自的家庭与故乡。

可以说，在加入军队、参与直接对敌斗争的行动背后，“乡愁”发挥了重要的激励功能。“乡愁”的两种形态可以成为斗争的动力：一种是有家可归者“乡愁”的弥漫，一种是无家可归者“乡愁”的失落。这里以散文《寄东北流亡者》²¹和小说《孩子的讲演》为例，对两种“乡愁”的动员力量分别进行分析。在《寄东北流亡者》中，萧红呼唤人们“应该献身给祖国作前卫的工作”，“拥护这个抗战和加强这个抗战，向前走”²²，努力唤起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们的抗战热情。而这样的号召，是以流亡者们关于东北的大地与家人的情感为中介的——在文章的开头，萧红就以抒情的笔调写道：“当每个秋天的月亮快圆的时候，你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²³

²⁰ 萧红：《放火者》，见《萧红全集·散文卷》，版本同前注，第310-311页。

²¹ 《寄东北流亡者》首刊于1938年9月18日《大公报·战线》（汉口）第191期。后来的一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疑似在《寄东北流亡者》基础上改写而成，后者首刊于1941年9月1日《时代文学》（香港）第4期。

²² 《萧红全集·散文卷》，版本同前注，第303页。

²³ 同上注，第301页。

“月亮”作为思乡的代表性意象，直接触发了流亡同胞们心底的“乡愁”；而高粱、母亲和亲眷，则让这样的“乡愁”更加具体化。当读者想到这些美好的记忆此刻却在被敌人和炮火残忍地蹂躏，愤懑之情便会充满心胸。对于有家可归的人们而言，越是抒情的笔墨，越是温暖的意象，越能唤起支持抗战、拯救家乡的热忱之心。

而小说《孩子的讲演》，则呈现出了“乡愁”的失落所产生的动员力。在盛大的欢迎会上，孩子王根开始了他的讲演：“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人，我就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²⁴ 小说结尾又写到，往日在家的时候，王根会在害怕时呼喊妈妈；而现在的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里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²⁵。可以看到，对于热烈的抗日斗争的热切向往，让小孩子王根自觉地割断了自己的乡愁。如果说“乡愁”是以“家”牵绊着自我，那么抛弃“乡愁”之处，便是忘我的抗争开启的地方。连一个小小的孩子都能够勇敢地斩断乡愁、舍身为国，身为听众的大人们又怎能被个人的小家利益所迷惑，而忘了大家与国家呢？这场“孩子的讲演”揭示出离开家庭而加入抗战队伍，是每个人随时都能够采取的行动。在孩子稚嫩而坚定的勇气面前，人们再也没有逃避抗战的借口，这一讲演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在不共享类似生活经历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的强大的共情效果。如果说“乡愁”只是停留于空洞的抒情层面，那么对“乡愁”的自觉放弃将激励人们努力使回乡成为现实：“乡愁”的失落所带来的动员力由此而生。

在自觉地放弃“乡愁”以外，“乡愁”也可能被迫失落。这就涉及“乡愁”向仇恨的转化问题：当战争使人们失去亲人和家庭后，对于敌人的仇恨是否会被激发出来？人们是否就能毫无牵挂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答案可以是肯定的，如萧军《八月的乡村》就采取了这样的情节设计：普通的农村妇女李七嫂在失去了情人和孩子后，很快转变为英勇的革命者，将仇恨的怒火直指日本侵略者。²⁶ 老舍的《一块猪肝》也是如此：女孩光奶在逃难时与父母失散，于是选择了成为随军医护人员：“父母可以死，家产可以丢掉，立场主张可以抛开，我要作马上能作该作的事。我只剩了一个理想，就是人人出力，国必不亡……”²⁷但在萧红的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这样果断的转变。无论是《旷野的呼喊》中失去独子的

²⁴ 《萧红全集·小说卷二》，版本同前注，第64页。

²⁵ 同上注，第67页。

²⁶ 参考田军（即萧军）：《八月的乡村》，上海书店1985年版，根据上海容光书局1935年版影印。

²⁷ 《老舍全集（第七卷）·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6页。

陈公公，还是《莲花池》中失去唯一的亲人的小豆的爷爷，萧红都没有让他们迅速转变为战斗者。两篇小说都在对人物失去亲人的苦痛的描写中戛然而止，“乡愁”的被迫失落并没有立即激起小说中主人公的抗敌斗志。不过，《生死场》中二里半这个人物的转变，也许可以成为上面两篇小说未完成的结局。原本对国亡毫不在意的“落后”人物二里半，在先后失去孩子和妻子后，终于决定要投奔“人民革命军”。他已经没有家人可以牵挂，唯一的牵挂只有一只老山羊：“他要使自己无牵无挂，好像非立刻杀死老羊不可。”²⁸ 当家庭被日本侵略者彻底破坏，“乡愁”尚未开始便已终结，“无牵无挂”方可舍命抗敌。因为战争而被迫失落的“乡愁”，召唤出的是义无反顾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战斗替代了“乡愁”，成为了人们在战时维系自身生存的新的依托。

虽然可以设想陈公公与小豆的爷爷也像二里半这样去参与斗争，但我们不妨再次回到《旷野的呼喊》与《莲花池》的文本，思考萧红为什么没有给人物设置这样的结局。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萧红缺乏战斗经验，对于抗日战争的素材并不熟悉：她没有如萧军那样成为军队中的文人，没有直接参与到抗日前线的活动中，而是一直以漂泊者的姿态日渐退守到后方，努力寻找一个相对安宁的写作环境²⁹。因此，萧红很少写热血沸腾的战斗人物，即使书写战斗，也往往是从多角度侧面处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萧红笔下人物命运的未完成性，并不等于对于斗争的怀疑：对她而言，抗战无疑是必要的，胜利也是必然的。《窗边》中的一句话形象地描述出了萧红对于战争的感受：“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爱的。”³⁰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夺回失去的家园，对敌作战是必须的；然而真实的炮火和枪声，却是可以随时夺人生命的事物。萧红敏锐地捕捉到了“崇高”与“现实”的矛盾：谈起高尚的理想人们可能热血沸腾，但在这样崇高的斗争中，生命一旦失去，就永远无法挽回。或许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珍重，让萧红无法轻易地使她笔下的人物投入战斗的漩涡。

尽管在《旷野的呼喊》、《莲花池》等小说中，我们不知道人物最终走向何方，但小说已经达到了目的：它们已经写出了战争给普通百姓造成的苦痛，至于这些人物该如何选择，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从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字也已经实现了应有的动员意义：当小说在读者心中激起强烈的情感，读者对于应该采取怎样的战时立场和行动已然不言自明。套用王德威的说法，或许对于萧红而言，这些

²⁸ 《萧红全集·小说卷一》，版本同前注，第293页。

²⁹ 例如逃居香港九龙时，萧红在致白朗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王观泉主编：《怀念萧红》，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再如罗荪在《忆萧红》一文中，提到萧红向友人提议到重庆后开一间文艺咖啡室，为作家们的灵魂营构一个“美丽的所在”。（王观泉主编：《怀念萧红》，第144-145页。）

³⁰ 《萧红全集·散文卷》，版本同前注，第256页。

写出人物之彷徨迷茫的抒情性文字不过是一个“信使”³¹：当一致抗日的讯息已经传达到了读者那里，文字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四、结语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如何通过文学表现战争，成为了那个时代作家们所面临的难题。作家们是否应该把重心放在创作报告文学上，让文学成为战争的纪实？还是通过文学的虚构预言未来的胜利，让文学尽可能地鼓舞人们战斗热情？怎样的文字，才既能表现当时的战争，又能留存到将来，成为“伟大的作品”³²？

萧红小说集《旷野的呼喊》，被收为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第一辑。郑伯奇为这套文集撰写有《每月文库总序》，其中明确地表明了这套丛书的出版目的：“如今抗战进展到了新的阶段。我们更要发动广大民众，增强抗战力量，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最近政府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法……但是这种动员精神的工作，若要开展要深入，文艺各部门的活动，比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许更迫切一点。因为文艺是精神的产物，同时却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颓丧，高扬或堕落的力量。”³³ 在《旷野的呼喊》集中，萧红也以她独特的方式，努力让自己的作品发挥出鼓舞抗战、支援抗战的力量——而对于战争中“乡愁”的表现，正是萧红所找到的一条动员之路。

如果我们去追问萧红的战争书写何以会呈现出“乡愁”这样的抒情景观，我们或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萧红的女性身份：她以一个女子的细腻与柔情，体察到人们的战斗选择与“家”的羁绊之间的矛盾，感受到人们在维系战时生存所面临的种种精神困境。在性别以外，萧红的文艺观同样值得注意，她未去延安的选择，也隐隐折射出她在战斗与文学之间作出的微妙权衡。在某种程度上，萧红的战争书写是对于鲁迅之所谓革命时代不会有革命文学的遥远回应：萧红以她的方式，回答了战争时代如何由战争文学的问题。在那众多饱尝人世悲喜的小小人生中，萧红延长了她文字的生命——那些感动的力量，即使跨越世纪仍在向我们涌来。

（作者简介：李煜哲，女，（1995—），汉族，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³¹ 王德威：“陈映真觉得他的抒情写作不过就像是瞿秋白所说的，是一个‘邮差’，是一个信使。如果这个讯息已经传达到了受众或是听众的时候，这个抒情的自我就已经焕发成为一个集体抒情的群体了。在那个时候，文学其实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你或我，都已经成为了这个抒情主体不自觉的代言人了。”（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3页。）

³² 见东平在《七月》座谈会上的发言，《萧红全集·诗歌戏剧散文卷》，版本同前注，第223页。

³³ 萧红：《旷野的呼喊》，上海杂志公司（桂林）1940年版，《每月文库总序》第1-2页。